

作为民主的新闻： 詹姆斯·凯瑞的新闻观及其知识贡献

方晨

摘要

为了改革“托管新闻学”公共性衰退的弊端，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作为民主的新闻”。“作为民主的新闻”反对将新闻看作是一种信息，而将其看作是人们获得新知的一种方式 and 对话商谈维系社会关系的手段。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和美国本土的历史经验中，并由此推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由于“作为民主的新闻”理论存在过于理想化、剪裁史实、没有设定目标等问题，因此受到了各种批评。但是，“作为民主的新闻”理念依然暴露出美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下的深层次矛盾，凯瑞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关键词

詹姆斯·凯瑞、新闻观、民主、对话

作者简介

方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电邮：studychen@yeah.net。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与理论镜鉴（1970-2010）”（18CXW006）研究成果。

Journalism as Democracy: James Carey's Idea of Journalism and its Intellectual Legacy

FANG Chen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orm the drawbacks of the public decline of trustee journalism, James Carey proposed "journalism as democracy". "Journalism as a democracy" opposes viewing journalism as a kind of information, but as a way of gaining new knowledge and a means of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This ide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od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us promoted the American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after the 1980s. The theory of "journalism as democracy"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idealization, tailoring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lack of goal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m as

democracy" still exposes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under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Carey played the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his movement.

Keywords

James Carey, The Idea of Journalism, Democracy, Dialogue

Author

Fang Ch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Email:studychen@yeah.net.

This paper i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youth program "the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mirror of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journalism history (1970-2010)" (18CXW006).

为了对抗主流的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传递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提出了具有“时间偏向”的传播的文化/仪式观（凯瑞，1989/2005：3-22）。传播的“文化转向”继承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探讨，试图从符号互动与文本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理解“作为文化的传播”。凯瑞的好友、学生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杰斐逊·普利（Jefferson Pooley）、乔治·保利（John Pauly）等延续了这一研究路径，终使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当今美国传播学界自成一派。新千年之后，凯瑞的传播思想逐渐被引介到国内¹，他和“传播的仪式观”一时声名大噪，其迥异于美国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传播学的研究路径迅速得到一些学者的青睐，各类围绕其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²

但是，当研究者热衷于用“传播的仪式观”来解读中国本土素材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凯瑞与“传播的仪式观”划上了等号。这在不经意间将凯瑞还原成一位单纯的传播学者，从而忽视了其学术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根据凯瑞之子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的整理，凯瑞一生撰写了180多篇研究论文、书评和演讲稿等（Carey，2009），只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了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凯瑞的治学旨趣涉及传播技术史、新闻与民主、新闻史、新闻教育等多方面，成为普利笔下不断变换声调的“口技表演者”（ventriloquism）（Pooley，2016：2）。凯瑞关注的都是传播与新闻的问题，但是研究思路与理论启发来自伊尼斯（Harold Innis）、格尔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杜威（John Dewey）、伯克（Kenneth Burke）、罗蒂（Richard

Rorty) 等不同时代、不同学科领域的思想家。这种多元化再一次印证了传播研究“十字路口”的特征,同时也引导我们更深入理解凯瑞学术思想的可能方向。事实上,关于凯瑞的新闻观念、传播技术思想等,国内现有一些研究也有提及³,但是却并未就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论证过程进行详细研究,也甚少提及这些观念与其传播的文化研究有何种思想勾联。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把凯瑞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的话,那么“文化”是否就是凯瑞学术思想的核心观念?他的新闻思想与其传播思想有何种勾联?所以,要回应上述疑问,需要理解他在各个议题上的认识,从而可能联结拼凑出凯瑞思想整体的学术地图。近年来,凯瑞的新闻史观、文化研究方法等已经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⁴。本文之目的,亦在延续这样的讨论,通过相关文献来讨论凯瑞关于“新闻”(journalism)本质以及新闻与民主、新闻与共和等问题的探讨。

一、新闻不是什么:传统新闻业的弊端

与纯粹的理论家以概念(concept)作为逻辑起点不同,凯瑞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现实状况出发,进而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探讨。他对新闻以及新闻业的讨论,也建立在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新闻业的观察思考之上。在经历了战后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现代共和政治”和“渐进的保守主义”的稳步发展之后(马丁等,2006/2012:1202),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叠出,各种危机浮现。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体现出美国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而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突显出国内传统精英阶层与新草根阶层的激烈矛盾。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趁机加速了对于社会的控制,将其触角延伸到包括大学和新闻业在内的诸多社会团体中。大学学术研究和课程设置日益服膺于商业逻辑和资本力量,课程导向与学术研究的过度专业化和实用性倾向破坏了大学应有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批判的道德品质,被凯瑞称为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Carey,1978)。传统新闻业在经历了“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事件⁵报道的“顶峰”后日益“衰落”(Carey,2003:84),虽然也尝试过调查性报道、新新闻主义、人情味新闻学等新的报道方式,但是总体而言除了受到专业内有限的支持之外,并未撼动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传统新闻业模式(Schudson,1978:3-10)。

一方面是充满变革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保守、“死气沉沉”的新闻业。对新闻业批评的兴起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媒介批评不仅见于业内学者，而且还吸引了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域外”知识分子（Herman & Chomsky, 1988: 1-36）。具有强烈公共知识分子认同的凯瑞自然也加入其中。从1974年开始，凯瑞陆续发表了《新闻和批判》（*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1974）、《记者刚刚离开：一个不协调行业的伦理学》（*Journalists just leave: the ethics of an anomalous profession*, 1987）、《新闻业和公共话语》（*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1987）、《新闻业、舆论和公共话语》（*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1995）、《大众媒体和民主：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The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1993）等一系列探讨新闻与当代美国民主政治的论文，而且还召集、参加了多次相关问题的学术对话。⁶

凯瑞认为传统新闻业充满了各种弊端，这些弊端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候选人追求媒体“曝光率”而不深入社区、媒体操纵一些没有价值和细枝末节的议题、媒体热衷于揭发政治人物的隐私等使得这两场选举投票率低下。这在凯瑞看来不但是新闻业的危机，而且是民主的危机（Carey, 2003: 86-87）。所以，他认为应该由表及理、由外到内，从“业务操作—职业理念—职业道德”来重新审视传统新闻业，寻找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在分析凯瑞的批判逻辑之前，首先有必要简要说明美国传统新闻业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

按照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看法，历史上美国新闻业主要呈现出三种模式：“市场模式”“鼓吹模式”和“托管模式”（舒德森，1999/2009: 115）。

“市场模式”的新闻业要取悦于受众与广告商，消费者是新闻产品的最终裁决者。

“鼓吹模式”意味着新闻业是政党、教会、社会团体观念的鼓吹者。美国历史上的政党报刊阶段就是鼓吹模式的典型。“托管模式”中新闻业则将自身看作一个专业团体，他们受公众委托去采集新闻，并且为他们提供各种专业观点来有效地行使公民权。而就当时的美国而言，实际上是市场模式和托管模式的混合体：新闻业接受民众的委托去搜集、撰写和告知新闻，同时作为民众的代言人，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从而获得公众的信任并生产出“巨大的受众”（great audience）。媒体将“巨大的受众”卖给广告商，从而获得职业独立和经济效益。为了获得“巨大的受众”，媒体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显得更加专业，遂由此发展出一整套职业理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这种美国现代新闻业的生存发展逻辑就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表达出来。凯瑞将其核心理念归纳为“独立、中立、对抗者、客观、无党派和真正的第四等级”（Carey, 2003: 78）。“独立”意味着新闻业是独立

的机构不受党派掣肘；“客观”“中立”是新闻业的基本立场；“对抗者”意味着新闻业监督政府、利益集团等各种权力，充当“看门狗”的角色；“第四等级”意味着新闻与总统、国会和法院并列，扮演着维系民主的角色。这套模式在进步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越战、水门事件等很多国家重大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民权不断伸张、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受到冲击的时代，新闻业自诩的理念从行动到理念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境（凯瑞，1999/2009：56）。

从最基层的专业操作而言，凯瑞认为所谓的新闻专业性已经越来越僵化。它越来越像是一种“形式策略”（stylistic strategy），在按照工业标准化的模式生产新闻（Carey，1974）。新闻业习惯性用各种“框架”（frame）去报道新闻，通常只是关注一些事件的表象，而没有进一步详细的分析。以越南战争为例，媒体用一些剪辑过的图像、照片、磁带等建构出线性的越南战争，却并不能回答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谁在资助战争、战争背后的政治真相是什么。报道被限定在事件与人物上，并不能反映事件的历史语境、政治行动者的动机和目的等。这种操作的“僵化”还表现在新闻业的所谓“分口条线”（the beat system of reporting）报道：记者每天围着白宫、国务院、国会等而成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凯瑞敏锐地意识到，新闻业在用专业性建构所谓的“主流化（mainstream）生活”。他们与“被麻醉的受众”达成了某种“寂静的共谋”（silent conspiracy）来强化了这种“主流化生活”：“将一个房子所有的门都锁起来即便所有的窗子都被打碎了”（Carey，1974）。

所以，新闻业所谓专业性操作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而根植在其中的价值理念也存在偏颇。客观中立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在凯瑞看来是难以实现的。第一，新闻业不可能客观。凯瑞认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于人性弱点的分析，认为理性人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将新闻业看作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事实上是犯了将自然科学探究真相（truth）的方法简单移植到社会科学的错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于“科学主义”的迷信让新闻有成为科学的努力⁷，但是因为参与者、所面对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新闻业充其量只能是“类科学”（quasi-scientific），它根本无法排除人们的价值判断，更不能提供科学主义吹嘘的真相（truth）（Carey，1997a：245）。所以舒德森的看法是正确的：客观性只不过是新闻业为了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种策略性安排（Schudson，1978：5-7）。那么，如果按照李普曼的设想把对真相的判断权抛给专家，那么新闻业是否就能客观呢？凯瑞认为，专家学者也有各自的倾向，代表不同的群体，更多的时候专家间

意见相左也难以提供中立的观点（Carey, 1987a: 16）。第二，新闻业不客观。新闻业的客观是以独立为基础的。但是新闻业只是独立于党派政治，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托管新闻业看似以超然中立的形象出现，但事实上不可避免与社会其他组织产生联系。新闻业宣扬客观独立实际上是为了建构一种超脱党派的、中立的、效忠于选民的、进步主义的角色形象。它的出现与进步主义时代“揭黑”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契合，也是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的社会地位（凯瑞, 1999/2009: 54）。

事实上，托管新闻业发展至今，诸如以上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大规模的批评运动就包括哈钦斯委员会报告、新新闻主义运动和建立全国新闻评议会运动等（凯瑞, 1999/2009: 56）。但是新闻业往往以新闻自由和职业伦理作为抵挡武器，将社会对新闻业的伦理要求指责为侵犯新闻自由。凯瑞认为，这种回应是傲慢的，其学理没有稳固的根基。第一，新闻业以获得真相（truth）作为其职业伦理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法学的基础是公正，医学的基石是健康。但是新闻业的基石却不一定是真相（truth）。因为求真只不过是一项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每一个母亲都会告诉孩子要讲真话一样（Carey, 1987a: 8）。第二，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缺乏明确的服务对象，这在西方以契约精神为准则的职业伦理中十分尴尬。医生的对象是病人，法官的对象是原被告。他们依据对象来提供相应的职业伦理责任。而新闻业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而没有目标群体。这使得契约关系模糊不定，加之记者自身只是受雇佣者而非独立的参与者，所以他们与其服务对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存在契约的基础（Carey, 1987a: 8）。

凯瑞的分析实际上点中了托管新闻学理论的一个“死穴”：即这种托管关系只是新闻业为了自身合法化而想象出的一种抽象的关系。公众不能也不可能与新闻业建立明确的托管模式。但是，新闻业长期以来却把此视为理所当然，并把新闻自由作为应对危机的“尚方宝剑”。这在凯瑞看来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从历史上看，新闻自由是近代中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口号，它的一个目标是“反王权”和“去专制”。对于美国而言，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开始是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是对他们革命成果的维护。所以保护新闻自由事实上是保护财产自由，是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中产阶级的权利（Carey, 1987a: 10-11）。但是，法律与伦理毕竟是不同位阶的概念，新闻业用低位阶的“消极的自由”来回应公众期待新闻业做的“积极的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逃避的行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一种法律条款规定，不能成为更高位阶职业伦理的借口。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来看，新闻自由也并不只是新闻业

的自由，而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新闻业以此作为一种行业自由，甚至以此来对抗各种社会伦理要求，实际是一种越界侵权行为（Carey, 1987a: 10-11）。在凯瑞看来，新闻业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代表他们自身，如果要成为公众的代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因此和它产生负责的、基于信托的联系；第二，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不是政府或利益集团或两者的共谋；第三，公众必须相信新闻界能够表现这个世界（Carey, 2003: 84-85）。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新闻界代行新闻自由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民众越来越不相信新闻业，还把他们看作是民主进步的障碍。新闻业的职业伦理越来越缺乏存在的合法性。

通过以上从职业操作、职业理念到职业伦理的分析，凯瑞认定必须变革托管新闻业。其危害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还在于它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它把受众只看作是消费者、客户和被托管的对象，造成了美国公共生活的全面衰退。首先，民众成为李普曼所说的没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缺乏政治参与的能力。这样公众只能是被告知的对象，在政治生活特别是大选中只能“支持”或者“反对”而不能更深介入，进而造成了人们的政治冷漠症（Carey, 1997a: 248）；其次，为了市场需求一味追求受众喜好而将新闻娱乐化，记者成为“偷窥狂、治安队员和律师”，造成了个体精神的麻醉与公民能力的下降（Carey, 1997b: 221/2001: 19）；再次，为了迎合市场与政治需要，新闻业衍生出民意测验和公共关系，使得公众意见被简化成抽象的统计数据，公共交谈变成了公共关系与民意劝服。公共领域逐渐被蚕食，人们要么成为消费者要么逃离，退化到私人空间和电视机旁（Carey, 1997a: 247-248）。公众在公共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剥夺了，只能沦为旁观者与看客。

这种民主的衰退持续不断，造成了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方面是天价的媒体收购案和财大气粗的媒体，一方面是民主的衰败（麦克切斯尼，2000/2004: 5-18）。新闻业不可能如建制派所言的可以自我维系与发展，而是走向没落。凯瑞认为，这种变迁应验了建国之父在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时的担心：民主或者共和在大约两百年之后有走向暴政的危险。人性的贪婪之下民主机制是脆弱的（Carey, 2000a）。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托管新闻业的“原罪”在哪里？

二、新闻是什么：作为民主的新闻业

凯瑞的回答是：没有搞清“新闻”（journalism）是什么。

作为近代新闻业发源地，居然没有弄清“新闻”是什么。这无疑是对一百多年美国近代新闻实践的最大讽刺。正如杰伊·罗森（Jay Rosen）观察到的那样，与建构“传播的仪式观”来对抗“传播的传递观”类似，凯瑞也希望正本清源，寻找另一个正确的“新闻”的源头，从而取代扭曲的“科学-托管新闻观”（Rosen, 1997: 197）。在凯瑞看来，“科学-托管的新闻观”与“传播的传递观”如出一辙，将新闻只看作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忽视了“新闻”出现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与其原始的文化基因，过分强调普遍性与规律性，走向了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极权化。他认为，这种科学的新闻学观念源自社会科学家，往往从外部（outside）而不是新闻本身来看新闻。这样，新闻就简化成一种缺乏“共同分母”（公众参与和对话）的实践，而成为一种机械的线性新闻业。新闻业充其量只能是一门手艺（craft），无法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批判视角。这种看似中立的视角忽视了“好的和坏的新闻、基础的和先进的新闻、有活力的和无活力的新闻”（Carey, 2000b）。

所以，凯瑞认为：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Carey, 2000a）。新闻与民主拥有共同的命运。没有新闻，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当民主不稳时，新闻就会不稳；当新闻扭曲时，民主也会扭曲（Carey, 2001: 19）。

这样的描述，勾勒出“作为民主的新闻”的基本轮廓。与“作为科学的新闻”试图将新闻与政治分离不同，凯瑞认为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新闻意味着民主政治，没有新闻就不存在民主政治。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不存在新闻，而只有宣传者（propagandist）；美国新闻业在“科学-托管新闻思想”的影响下也有逐渐沦落为公关者和宣传者的嫌疑（Carey, 1997b: 210-216）。那么，凯瑞所指的“作为民主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为什么必须民主？

凯瑞同样试图从历史的脉络中去找寻答案。他指出，他所理解的“新闻”对应词是journalism。它不同于communication，更和news、reporting有别。舒德森说得在理：news和reporting在十八世纪可能是不存在的。后者的出现通常意义上与近代的新闻实践有关联，所体现的是对于“经验的当代性的渴望——要新的而非旧的，要惊奇和新颖的而非生产历史的东西”。news和reporting实际上暗示着近代工商业兴起后商人、银行家们对于商贸信息的渴望，它们在十九世纪才逐渐与journalism成为同义词（Carey, 2007）。很显然，传统新闻史将三者混为一谈，将journalism与

news、reporting都归因于纯商业动机⁸。凯瑞希望找寻的正是被忽视的journalism的史前史：中世纪之后就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

凯瑞是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来理解新闻的。他认为，对新事物的渴望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知识的延续与发展蕴含在对史诗、传说的继承和对当下生活现象的求知与探索中。前者代表的是一种传统与文化的绵延，后者面对的是一种现实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本能在经历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发扬后，在中世纪被封建王权和教会神权大大抑制了。人们不具备了自我获知知识的能力，而只能听命于封建神权。新兴的中产阶层用商品经济瓦解了封建庄园经济，同时也在争取和扩大政治自由，从而打破教会的知识垄断。这一过程中人们生产了众多的表达形式：短文、小说、新闻与科研报告等（Carey, 1974）。除了科研报告在中世纪还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的保护以外，其他三项都是一种争取知识和表达自由的“非法”行为。这一过程从十四、十五世纪就逐渐开始，一直持续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就如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的融合进行（Carey, 1974）。

所以，新闻从诞生起就是一种争取民主的行为，它是人们获得新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并且与诗歌、散文、小说、科学报告等形式混在一起。教会神权的土崩瓦解后，新闻作为获取新知方式的地位大大增强了。因为它符合人类从经验到获得真理的过程。在凯瑞看来，后神权时代获取新知一般有三个科学原则：第一需要设定好一个发现的过程，第二需要抛弃带有个人情绪的语言，第三还需要一个纠正与完成发现的论坛。此外还要记录这一过程，如同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的长时间旅行的航海日志（log）（Carey, 1974）。而新闻，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新闻”这种纪事方式，记录下重要新鲜的东西，通过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确认真伪性，最终形成新知。这一过程伴随着各种证实与证伪，是一个不断讨论与争吵的过程。在争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规定了相对统一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相对标准的文本。

这就是新闻成为一种认识手段的过程，整个过程是民主的，对所有人开放的，具有公共性的，充满了热烈讨论与争吵的。所以，新闻就是民主，新闻维系着公共生活。新闻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凯瑞所理解的新闻，就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与哈氏不同，凯瑞更加强调新闻在建构“公共领域”时的不可替代性。但

是，对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个普遍批评在于其是否存在于历史中。而凯瑞为了回应这种质疑，也试图寻找“作为民主的新闻”的历史来源。与他对传播观念起源的描述类似（凯瑞，1989/2005：4-21），他找寻到两个源头：一个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传统，一个是北美本土传统。

法国的传统实际上是威廉斯提到的“漫长的革命”的一部分，是启蒙时代人们思想活跃的体现。它的重要性在于直接催生了journalism这个词汇。凯瑞考证后认为，journalism来自法语词“天”（day），意思为记录日常生活记录的实践，包括今天所说的新闻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法语词Nouvelle就包含着小说和新闻两重意思。延续了文艺复兴后获得新知的方式，得益于人们能力读写的提升、廉价纸张的出现和写作工具的普及，更多的人开始从事journalism这一实践。他们通常倾向于记录一些新的、当代的、能答疑解惑的问题，并逐渐综合成一个系统而被社会化、集体化。这一综合的过程中，人们确定了真实原则，将新闻与小说分离；建立了自身的语言形式，将新闻与诗歌、散文分离；建立了平等争论、共同完成的原则，使得新闻成为一个社群共享的一种集体记忆，并由此发展出journalism的新储存、新分发方式等（Carey，2007）。

在反抗波旁王朝的斗争中，journalism的民主特色得以进一步彰显。根据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研究，为了打破波旁王朝的信息管制，巴黎市民主要在克拉科夫树下（tree of Cracow）和各种沙龙中进行信息交换。这些信息来自不同地方，通常由专门人采集，包括艺术家、外交官、商人、手工艺者、法庭低职位者、仆人等，通过在树下放置纸条、在树下密谈、在沙龙门口放置消息纸等方式来搜集贩卖信息。同时，这些人也是接收者，他们互不认识但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交换信息、查实真伪、评价事件与人物。虽然这些信息的内容大部分是来自凡尔赛的宫廷秘闻，但是正如达恩顿所言，这一过程不仅是线性传递和消极接收，而且还有信息吸收的过程以及团体再加工。这其实就是创造一种集体意识或者公共意见的过程。这一公共领域揭发了波旁王朝的腐朽，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基础（Carey，2007）。

所以，这段历史清晰地体现出了新闻作为一种方式去争取民主的过程。它根植于法国舆论斗争史中，在凯瑞看来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Carey，2007）。它“是一种有想象力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场民主共和运动”。他反对社会科学家用一种普遍化的视角看新闻，认为这样忽视了新闻扎根的历史社会土壤。他也反对人文主义者和英国文化研究者将新闻还原成一种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只能看到权力的斗争而忽视了新闻中的认知、道德、

审美等多个面向。所以，他认定新闻就是新闻，不属于社会学、历史学或者文学，新闻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Carey, 2000b）。

这种认知使凯瑞同样坚信可以在早期北美历史中找到新闻（journalism）的影子。而且与欧洲类似，北美的新闻（journalism）也是内生驱动的。他指出：

对美国新闻、政治和民主的最初理解来自公共房间和殖民地时代的小酒馆。小酒馆被那些通常是出版商的老板所管理。老板们从酒馆的对话中和消息灵通并在酒吧日志中写下见闻的旅行者那儿采集信息。出版商接着会记录这样的对话、窃窃私语并且印刷它，为了日后的保存和发行。他们还印刷演讲、谈话、布道、畅销商品信息、那些聚集在公共场合的人的政治观点，这些人大部分是商人和贸易者。在公共房间中流传的报纸使得对话和讨论更有生气。结果是，新闻（journalism）——对演讲的反映——成为不间断的对话之流，不是在立法机关的大厅里，而是在公共房间中（Carey, 1993）。

所以，北美殖民地也存在新闻的实践：它依旧是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新消息（news）。一些外交家和旅行者也都描绘了当时北美的新闻实践活动。一位法国外交家就曾生动地写道：“他们同时已经印刷了新闻，他们热烈地在酒馆和公共场所聚集起来。他们争论文章内容；他们检视所有的内容，所有的人都不例外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并因此自然成为谈话者和质疑者。”（Carey, 1997a: 235）而另一名旅行者萨姆·沃纳（Sam Bass Warner）更是记述了在“伦敦咖啡屋”（The London Coffee House）里的新闻实践如何影响到费城的公共生活。当时费城还是一个小镇，但所有的商人都首先到这里驻足，他们窃窃私语，在每一个中午聚会，讨论新的报纸、商品价格、安排货物和海运保险。在这个小镇中，管理者、邻居、商人等都集聚在这里，讨论小镇的公共事务，组织市政会议。而当革命到来时，这里还能快速地聚集费城的民兵组织。

整个十八世纪，酒馆都是新闻实践的主要场所。大部分的公共议程都在这样的争吵讨论中确立。市镇的行政者遵循了一条“小酒馆—街道—工作地点—公共房间”的路径。它能够将商人、艺术家、商店主等聚集在一起，为小镇提供服务并共同来抗击英国的统治（Carey, 1987b）。

由此可见，“作为民主的新闻”也扎根在了北美的土壤。但是，与法国新闻实践强烈的政治传统不同，北美传统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是商业传统的。虽然新闻实践的主角都是陌生人，但是商人和贸易者——而不是政治积极分子——是北

美传统中的主角。新闻活动最初也是由他们不自觉地发起的。第二是具有浓厚的乡村自治的特点。与欧洲大陆高压的政治环境相比,北美最早的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清教徒移民就以建立没有宗教迫害和政治清洗的“人间天国”作为主要目标。他们期待的是实现一种没有压迫、充满和谐友善的乡村自治生活。当“五月花号”的第一批移民签订了公约(Mayflower Compact)时,也就确定了北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平等协商与民主自治传统。新闻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当英国殖民压迫加剧后,北美以经济与商业为特征的新闻实践逐渐增加了政治面向,从而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发挥了精神粘结的作用。

通过这一串历史的追溯,凯瑞最终确信了他所认为的“新闻”的本质:即一群陌生人坐在一起讨论新消息、评价事件与人物,解决争论问题,最终实现新知识的获得、社群文化的维系与社会的有效管理。所以,新闻必定是民主的,任何陌生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它是一个公共论坛;新闻必定是批判性的,对话与协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激烈的争论;新闻必定是政治的,它鼓励社群的形成与对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而民主、公共、社群、政治等这些概念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彼此无法分离。

三、从“作为民主的新闻”到“科学-托管的新闻”再到“公共新闻学”

凯瑞对“新闻”的认识,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托管新闻业”的新闻定义。在凯瑞看来,他们把信息看得太重了,认为新闻传播就是信息传播,将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简化成5W的线性传播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们更加关注信息内容的准确科学性,而忽视了新闻作为一种人类实践的文化本身。这种对科学理性的极端崇拜导致了新闻从政治实践中撤离,沦为客观中立者角色;也使得受众失去了参与新闻实践的可能,成为旁观者和看客。那么,美国新闻业为何变成了科学-托管模式呢?要实现理想的新闻业将如何改革?

凯瑞认为,之所以出现从“作为民主的新闻”到“科学-托管的新闻”的“倒退”,有两大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是传播技术的变迁,一个是进步主义运动。前者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思维对于新闻的影响,后者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改变了新闻业的地位与思想观念。

传播技术在凯瑞看来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早在1970年,他和约翰·奎克(John Quirk)就批判过美国人对于电子媒体的崇拜(Carey & Quirk, 1970)。互联网的兴起又使他意识到传播技术的进步可以“推倒很多边界,但是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边界”(Carey, 2005)。传播技术的优点在于它使得隔绝变成了一体、地方

形成了全国。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电力的发明为界,凯瑞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的开始,全国性的传播系统如果缺乏电报的发明和全国铁路网的形成将无法建成。传播技术的发展让新闻日益扮演着“想象的共同体”的角色(Carey, 1997c: 128-141)。

但是,传播技术变迁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可逆的。凯瑞显然没有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乐观。他看到的未来世界不是“地球村”而是“空间偏向”(space bias)的急剧膨胀和“时间偏向”(time bias)的萎缩。人们日益关注今天美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而忽视了本土社区发生了什么。个体好像看似通过传播技术联接在了一起,但是却都彼此被分离在单独的房间中、电视机或电脑旁。如果说托管新闻业在发展前期(主要指卫星和互联网诞生前)还曾经生产过“巨大的受众”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受众则进一步分化为孤独的个体。报纸所建构的“大受众”进一步碎片化和溶解化。“作为民主的新闻”与公共领域进一步破碎,公共传播和政治的社群文化出现了“新巴尔干化”(new Balkans)(Carey, 1997a: 251-254)。

这些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在1992年大选中都得以体现。而进步主义则从社会思想观念中摧毁了“作为民主的新闻”的生存土壤。凯瑞指出,进步主义实际上是中产阶层(例如医生、律师、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发起的反对财阀与权力阶层的斗争。其愿景虽然是推动社会的善治,但是这个过程却伴随着这些新兴阶层对于国家职业地位的攫取。面对工人与资本家商人相对二元化的城市结构,进步主义者以科学、反传统的名义试图获取自身的一席之地。新闻业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在职业地位的提升和专业化上不遗余力,采取了包括推动新闻教育、编写新闻史、重新解读第一修正案等众多改革。以扒粪运动为例,他们赋予了自身“看门狗”的角色定位,标榜客观独立实际上是游走于政府、利益集团、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等的利益之间。所以,媒体虽然不再为政党服务,但却是各派争夺的工具。新闻业看似独立了,托管新闻业看似建立了,但是并没有达到新闻业自我宣称的理念(Carey, 1997a: 242-245)。

所以,凯瑞认为,社会改良的期许和新闻业不断上升的野心推动了“科学-托管新闻业”的确立。“科学-托管新闻业”迎合了当时民众的期许,表达了民众“只想逃离地方性和偶然性的愿望,对长距离和遥远的所有事情的热情,对国家而非省份的热爱。”(Carey, 1997a: 243)这在新闻业建立职业标准、建立全国传播体系等都可以看出。但是,凯瑞认为,进步主义运动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

主张中央集权和新闻专业化的李普曼派之外，还有杜威为代表的分权派（凯瑞，1989/2005：57-60）。美国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从而走向了越来越强调普遍性与标准化的道路。

凯瑞的分析，依然渗透着伊尼斯“传播偏向”思想的影子。凯瑞强调打破标准的“科学-托管的新闻业”，实际上就是要打破新闻业过于严重的“空间偏向”。

“作为民主的新闻”强调民主、对话与商谈，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一种地方性的实践，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关注，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凯瑞期待恢复的是十八世纪的殖民地生活传统。而这个传统中，凯瑞又特别强调重新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和重新认识社群。

重新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要从一种社群（community）的角度来理解其精神内涵。托管新闻业从“意见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将第一修正案看作是对于个体新闻自由的保护，保护新闻自由就是保护意见的自由市场，进而演变成保护新闻业。凯瑞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视角。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国会禁止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出版自由，实质上是希望通过公共谈话建立一个社群而不仅仅是保护个体的权利。这意味着个体的新闻自由并不是终点，而是建立公共空间的起点。为此，他赞同法学家托马斯·爱默生（Thomas Emerson）的解读，认为第一修正案对美国的共同生活贡献了四点：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思路；一种获得真相的方式；一种保护做政治决定的人们参与的思路；一种在稳定和变革中巩固平衡的方法（Carey, 1997b: 216）。第一点意味着保障人们的自我表达，第二点意味着通过言论自由表达可以找到真相，第三点意味着保证人们公共参与，第四点意味着提倡一种渐进的变革保持社会稳定。而这四点中，凯瑞认为第三点是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对宗教、演讲、新闻与集会等过去公共生活方式的一种确认，一种保护对话的方式（Carey, 1997b: 217）。

通过这样的转解读，第一修正案从强调保护个人自由表达转变为强调公共生活的重要性。自由民主也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演变成一个社群的问题。恢复传统社群精神也自然成为“作为民主的新闻学”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这里，凯瑞提倡的是一种“共和的社群”（republic community）。它不同于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描绘的专制、被监控的社群，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下压抑冷漠并行的小镇社群，而是一个真正（virtual）的社群。它以美德为基础，具有公民人文主义精神：容忍、伙伴关系、质疑、公共参与伴随着正当的私人性。在这个社群中，人们“必须表达和珍惜相互依赖但又不能牺牲个性；必须对抗

个人主义偏向；必须培育对普通人能力的尊重和创造机制来唤起培养这些能力”。同时凯瑞也认为，这种共和社群具有一定的弹性。它并没有假设共同根基或共同宗教；并没有使用“家庭”（family）或其他类似的隐喻；并不要求持续的、强制的参与；并不等待人们一起实现某个宏大的终极目标或者建立一种完全无私的兄弟之情。共和社群仅仅是在两个维度上强调它的粘合性：第一，在社会面向强调共同的社会空间，反对分离主义和排他性地强调私人生活。第二在政治层面上延续建国之父挑战传统、建设不曾存在过的共和体制的期望（Carey, 1997d: 1-14）。

所以，当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后，凯瑞就成为最积极的倡导者。他的“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理念，几乎与公共新闻学的诉求完全一致。这场以地区性小报发起的公共参与的新闻运动与凯瑞所提倡的民主的、地方性的、偏向时间的、共和社群的精神也高度一致。杰伊·罗森就曾高度评价凯瑞的工作，认为他为美国人重新定位了新闻与民主政治的正确关系（Rosen, 1997: 204）。凯瑞的好友、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同事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也认为凯瑞强调社群是正确的。不过他更进一步，认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应该是作为第一原则而出现（克里斯琴斯，1999/2009: 65-83）。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凯瑞“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质疑与批评也持续不断，这场关于新闻本质的争论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十余年。

四、众人的批评：“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缺陷

这场争论主要体现在两次公共新闻学的讨论会议上。一次是1987年召开的会议，参与者有舒德森、吉特林（Todd Gitlin）、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大卫·肖（David Shaw）等人；另一次是1996年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主持的会议，凯瑞、罗森、克里斯琴斯、舒德森、彼得斯（John Peters）、约翰·保利（John Pauly）、泽利泽（Barbie Zelizer）等一流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对于“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依据以偏概全、对核心概念理解简单化、对新闻业角色定位错位等几个方面。

首先，就历史依据而言，舒德森指出，凯瑞希望回到1927年的社群主义思想和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的市政集会模式，这高估了当时的民主程度。他的《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已经说明，当时操纵会议的依然是少数精英，他们操纵着议程的进行。而被凯瑞赞誉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赞扬美国模式的民主的同时，也提到了政党在利用这种集会模式来控制公民。但这一点被凯瑞忽略了

（舒德森，1999/2009：122）。进步主义运动中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舒德森认为也是凯瑞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有意为之，“李杜之争”的确切性是值得推敲的（Schudson，2008）。

泽利泽同样指出了凯瑞对历史的选择性忽视。在她看来，“中立与参与”实际上都是新闻业长期以来都信奉的理念。在新闻实践中，作为积极社会改良参与者的新闻业是长期存在的。扒粪运动、调查性新闻学都体现出新闻业的努力。新闻业的问题可能在于将客观中立作为一种哲学理念清晰表露出来了，而并没有从哲学上完整表达社会参与的思想（泽利泽，1999/2009：154-157）。

其次，对于一些核心概念，“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处理与思考也比较理想化。舒德森质疑公共生活是否真的如凯瑞说的那么美好。在他看来，公共生活在更多的时候是争吵的、琐碎的、妥协的、讨价还价的、耗费精力的、肮脏的，人们要获得友爱、友谊等更可能在小社群中而非大社会中（舒德森，1999/2009：122-127）。更重要的是，舒德森和格拉瑟都认为，凯瑞倡导的杜威时代的社群已经与美国当下有了非常大的区别。而且有了社群并不是就有了公共生活。凯瑞的一个认识是正确的：即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生活在两种环境中：一种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归属感的小社群，一个是陌生人组成的大公共。但是凯瑞的错误就在于误以为人的这两种属性是互不干涉的，人可以跨越小群体的一些标签而作为完全的陌生人参与到对话协商中。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人已经被高度社会结构化了，人们受到有共同价值观、归属感的社群的影响最大。个体在参与到的社会谈论时难以摆脱原有的社会标签。这意味着拥有了“小社群”未必就可以形成“大社群”。大社群中的个体间对话很难超越私人的一些目的而得到一种理想上“公共的善”（格拉瑟，1999/2009：7-12；舒德森，1999/2009：122-127）。

所以格拉瑟依旧倾向于个体首先通过职业、阶级、年龄、种族等差别形成一些特定的群体，然后再由这些群体形成一些社群意见在更大的国家范围内民主讨论。他认为合理的方式应该还是先形成一个复数的公众（publics）而不是一开始就形成单数的公众（a public）。这样的认识事实上又回到了传统代议制的原有框架中，寄托希望先形成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言的“公意”而非让“众意”无归纳总结地直接走到国家层面。格拉瑟并非反对根本性的变革，而是认为民主本身存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格拉瑟，1999/2009：11）。

这些障碍也是彼得斯对“作为民主的新闻学”悲观的重要原因。在彼得斯看来，民主一般要跨越四个面向的障碍：规模和人口、对人性的判断、社会结构的变

化以及公众对民主的渴望程度。古希腊的民主实践表明,实现理想的民主有规模要求。理想的公民人数在柏拉图看来是5040人。一旦人数众多时,大部分人并没有表达的可能而只能当旁观者。民主需要相信人的理性,但是非理性却是现实存在的。以民主典范著称的古希腊居然都出现了依照民主制度处死了苏格拉底。这说明了民主绝非完美的制度,民主的错误也会如暴政一般造成恶果。此外,民主本身受到阶级、种族、性别等在内的社会结构约束。自李普曼之后,美国的民众已经普遍对民主感到失望(彼得斯,1999/2009:97-101)。这些都会对“作为民主的新闻学”实践造成挑战。

例如“作为民主的新闻业”不能期待每一个人都去参与民主,因为一方面很多人精力有限,另一方面牵涉到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而且人性是多面的,严肃的政治生活只是一个方面,不应该忽视人性嬉戏玩耍的一面。所以在彼得斯看来,民主制度在现实实践中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与其徒劳地让人们迷恋民主,不如承认民主的缺陷。因为这些缺陷是人类不能逾越的。民主只能作为一个理想而存在,它的“最伟大之处不是提醒我们人类有伟大的智慧,而是指出了我们的巨大愚蠢,它教导我们要审视自身。它不是向我们建议距离能被缩短,而是指出地方生活是艰难的,需要我们的劳动。它警告我们,试图打破参与的所有障碍是不可能的,因为互动排他性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不完善的政治生活形式,民主需要的不是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的温柔对待”(彼得斯,1999/2009:111)。

所以,既然理想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凯瑞对于“新闻就是民主”的定位就值得深思了。舒德森、彼得斯、泽利泽和乔治·保利都意识到,或许学术界过高估计了新闻业在实现民主中的作用。彼得斯就认为,公民社会需要的是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包括街坊、公共图书馆、法律法规以及媒体。新闻并不是唯一力量。不要把公共新闻看作是拯救公共生活的唯一救世主。民主是一个结构问题,要从多层次去解决(彼得斯,1999/2009:108-109)。舒德森也指出,新闻业确实可以建构良好的社群关系,但是并不是唯一因素。单靠唯一的新闻业,事实上无法建立好的社群。他甚至激进地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既然强调民主,就干脆取消新闻业,让公民都成为新闻业的一员。何苦来一个保守的改革运动,逼着新闻业融入政治生活、引发召集公共讨论,而并没有把新闻行业的所有权力让渡给广大受众而还是还给了记者(舒德森,1999/2009:119-121)?泽利泽也认为“作为民主的新闻学”要求传统新闻业改变得太快,实际上新闻业一直在不断改良自己,从调查性报道到新新闻主义,而凯瑞们显然等不及这样的改变(泽利泽,1999/2009:149-163)。新闻业

承受了学者给它的不能承受之重。

格拉瑟同样认为凯瑞们给新闻业的定位是勉为其难。但是他更强调新闻业本身的能力局限。他指出,“作为民主的新闻学”期待新闻业成为社群运动的参与者。他们赋予新闻业组织引导民主对话的职责。更像是一场比赛中的裁判员,新闻业需要制定公共讨论的规则、提供相关信息促进讨论。但是,“作为民主的新闻学”并没有涉及到“什么是善”这样的本质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终极的“善”,新闻业无法履行监督、引导规则执行的任务。公共新闻业批评传统新闻业现实的民主是不好的,但是并没有说明最终的善应该是如何的。哪怕像罗尔斯(John Rawls)一样,为了调和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关系,提出“善的不充分理论”、为“善”设置一个基础的目标与近景。但是,凯瑞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可能会导致公共新闻业无法处理小社群和更大的国家社群间的关系。如果公共新闻业真的促进一个社群共同意见的形成,那么当各个社群意见相左时,一个公正的新闻业应该如何办(格拉瑟,1999/2009:7-12)?

五、结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凯瑞

以上批评都从不同层面发现了“作为民主的新闻”的缺陷。事实上,作为一个批判理论,“作为民主的新闻”确实并没有提供多少建构的路径与方式。与凯瑞对传播仪式观、新闻历史观的讨论类似,他所期待的只是对话与争论本身,而并非一定要获得确切的结论。以传播的仪式观为例,他所关心的,是能否在“传播的传递观”外寻找到一种对传播理解的新的可能,至于“传播为何是仪式”“传播如何成为仪式”等问题,只要能引起同人的热烈讨论就已经达到目的。新闻文化史观也只是提供了“研究新闻报道所蕴含的过去的人‘感觉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模糊路径(Nord,1988)。他的“作为民主的新闻观”同样充满了很多未定项。凯瑞也并未完整地回应各种质疑,只是用“刺激和恢复幻想与理念也很重要”加以回应(Carey,1997a:228)。作为学术同人,杰伊·罗森曾试图给“公共新闻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罗森,1999/2009:22-23),但是在一些实践性的问题上依旧无法说清:比如鼓励公民参与和对话,那么新闻业如何来鼓励,依据什么来制定游戏规则?强调恢复民众的公民身份,可以采取哪些路径与措施?期待在对话中形成真理,那么如何来判定真理的科学性?

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是难以完整回答的。因为这牵涉到的不仅是新闻业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问题。在自由主义盛行了二百多年的美国提倡社群主

义，必然要提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可替代方案才更具有说服力。而且“新闻”的内涵本来就是多面向的，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检视并认可其合理性，并不必然要相互否定（Nord, 2001: 3-14; 李金铨, 2017）。从一种基本的认识来看，“作为科学的新闻”侧重于新闻实践的内容，而“作为民主的新闻”强调新闻实践的行为本身。所以，“作为民主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2003年皮尤公共新闻中心关闭，这场以凯瑞的“作为民主的新闻”为理论基础、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公共新闻运动趋于冷淡（展江，李洋，1999/2009: 22）。传统新闻业如舒德森所言，再一次保持了它的延续性。而当新媒体以迅猛发展之势冲击着传统新闻业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希望传统新闻业做什么”，而在于“我能用新媒体做什么”。放眼当下，技术赋权已极大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傲慢”，个体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也大大提升。但是，众声喧哗下随之而来的是充斥网络的各种假新闻、有偏见的认识，人们已开始感慨“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境遇迫使人们的思考方式发生了转变，所思考的问题也不再只是凯瑞时代所面对的“传者-受者”的传统传播学二元框架的问题。新闻与民主的问题事实上也必然以一种全新的命题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但是，如果抛开公共新闻学的得与失，暂且不论理论发展滞后和现实演进迅速的对冲，单独从凯瑞学术思想的整体来看“作为民主的新闻”，其思想遗产依旧颇为丰富：

（一）新实用主义的新闻观

凯瑞的贡献在于在“作为科学的新闻”之外发掘了“作为民主的新闻”。这是他对两种传播观念讨论的延伸，也持续了他对于民主、对话、社群、公共的关注。在这一点上，他的新闻思想与传播思想具有共通性，都总揽于其文化研究的视角中。这一视角是韦伯、芝加哥学派和格尔茨思想的结合，是从一种非经济决定论和非意识形态至上论的角度来看新闻与传播的问题。因为在凯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忽视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而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又将文化斗争简单还原成意识形态斗争而忽视了文化的丰富性（Pooley, 2016: 167-170）。他对“文化”的理解更接近于文化人类学的思路，认为文化有其相对独立性，具有能动性，而且囊括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这一认识，与同时期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林·亨特（Lynn Hunt）、达恩顿等文化研究和文化史学者的观点交相呼应，是西方学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文化转向”的突出体现（周兵，2013: 13-32）。所以，在他的视野中，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皆可发现“文化”的影子。

“新闻”自然也是一种人们自发形成的文化行为，是人们建构“意义之网”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互动与交往行为。

在这一点上，“作为民主的新闻”不但并未偏离“文化”的范畴，而且还进一步明确这种文化必然要和实践结合。凯瑞以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为另一精神导师，认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在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获得真理。他所强调的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新闻”就是要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当时“科学-托管新闻理论”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科学-托管新闻理论”背后影射的是的经验学派和“类科学”的价值取向，关注的是所谓知识的增长而不讨论这些知识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一个个辉格史“神话”（myth）被创造、原有的范式故步自封。而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等旧实用主义者通常又在旧有认识论中讨论经验、心灵或意识的不同，没有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而罗蒂新实用主义接受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资源，意识到了语言或话语（discourse）才是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Rorty, 1999: 95）。解决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困境不能像经验学派那样在旧认识论的道路上再从事所谓的科学研究，而是要借助话语分析批判原有范式，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新闻学和新闻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解决美国的民主困境（Carey, 2000b）。通过这样的路径，话语分析作为“批判的武器”登场，而强调关注人类行为实践性的文化研究作为候选项填补了留下的理论真空，两者从根本上都统一于新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下。因此，在这种新实用主义新闻观的统摄下，新闻自由就不应当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解的“免于……干涉的自由”，而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要做……的自由”。这种分野，亦即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之分，实际上是对主流社会日益保守而缺乏改革动力的不满。“作为民主的新闻”，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新实用主义的理念，还不如说它所回应的已远非学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从新闻到现代政治哲学

因此，与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出发点有所不同⁹，凯瑞更多是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对于“作为民主的新闻”的讨论的。由于深受伊尼斯的影响，他对新闻与传播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学科本身，而是上升到对于西方文明整体发展的忧虑之上。西方文明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蓬勃发展，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却因难以调和的各种矛盾显露出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这种现代性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个体日益被裹挟在一种普遍性一元论中而高度地组织化和结构化。而这种

普遍性的一元论又成为评价文明/野蛮、先进/落后、西方/东方的标准。于是，一元的现代工业文明不仅要一统西方国家内部各地区，而且还在全世界扩张。西方现代文明成为唯一的先进文明，而东方的、地区的文明要么降格为一种边缘文化，要么完全被吞噬¹⁰。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建立在理性的野蛮生长上的，在韦伯所言的“祛魅”（disenchantment）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将自身作为新的权威和神像（霍克海默，阿道尔诺，1969/2003：4-8）。于是，当宗教神权隐退之后，人性贪婪、自私等弱点也急剧膨胀，遂造成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动乱。事实上，从韦伯时代开始，就不断有知识分子反思西方文明走向“歧途”的原因，自然也引发了同样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结、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伊尼斯的思考。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从传播的独特视角发现了传播偏向的问题，并由此揭示了西方文明如何在“空间偏向”的引导下走向现代性并因此产生巨大危机的过程（伊尼斯，1951/2003）。凯瑞基本继承了伊尼斯的思考，并深信他对西方文明“生于时间、死于空间”的判断（Carey，1999：81-104）。故而，凯瑞也赞同以“时间偏向”来平衡“空间偏向”，用恢复社群、恢复口语传统的方式来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与平衡，进而拯救与维系西方文明。

因此，当现代性的发展抽去了“在地”的历史传统时，他大声疾呼用新闻来拯救“陌生的邻居”。这种对话与交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弥合剂和力量的平衡，反对一元论的独霸与操纵，强调中央与地方的沟通、解构者与建构者的交流、历史与现在的对话、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协调。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美国都普遍存在，并在某些方面有激烈的表现。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建国初期、美国内战（Civil War）就已有展现，解构与建构作为一种相互交织力量伴随着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历史与现在的矛盾清晰体现在当时社会科学研究“非历史化”（ahistorical），个人与公共的界限一直是美国政治哲学家争论的话题。凯瑞的“作为民主的新闻”正是希望新闻的介入让这些矛盾的双方形成对话，消除你死我活的对抗与冲突，在渐进中解决社会的矛盾。

所以，正如舒德森所言，凯瑞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舒德森，1999/2009：119）。他信奉的是黑格尔（Georg Hegel）在谈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遗产时说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黑格尔，1821/1979：11）。而其中的合乎理性，即黑格尔强调的绝对精神。前半句强调现实的合理性，认为凡是经验地存在的，都有其符合绝对精神的因素；后半句强调理想的必然性，认为先验代表着一种憧憬，起初会先与历史对抗，但最终会转化成经

验的形式与结果，最终回到历史中。

凯瑞告诉我们的，正是在承认“现实是现实的”的基础上要坚信“理想并非只是理想”。如果要进一步追溯，他试图融合的是近代启蒙精神中欧美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先验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观念。经验论以洛克（John Locke）与伏尔泰（Voltaire）为代表，强调经验在前；先验论以卢梭与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强调理性的先验和终极的价值关怀。在英美国家信奉经验论，由于“政治思想偏重工具理性，拒绝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目的追问及道德热情……普遍发生了社会性精神危机与政治冷漠症”的情况下（朱学勤，2003：313），凯瑞的努力，正是试图给美国播撒下某些理想的种子，从而为美国社会留住变革的希望。

（责任编辑：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笔力所及，1996年华人学者潘忠党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凯瑞与传播的文化观，是为凯瑞较早进入国内学人的视野。2002年，凯瑞的一篇关于新闻教育的论文被节选翻译在《国际新闻界》，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2005年，凯瑞重要的论文集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中译本出版，国内学人对于凯瑞的研究开始日益升温，并出现了研究专著。参见潘忠党（1996a/1996b），李欧梵（2002），郑保卫（2002），周鸿雁（2012）等。
2. 参见潘忠党（2005：103-124），樊水科（2011），胡翼青、吴越（2014），方师师、於红梅（2010），周鸿雁（2012），郭建斌（2006）等。
3. 参见潘忠党（2005：103-124）、黄旦（2005：88）等。
4. 参见周鸿雁（2012），方晨、李金泳、蔡博方（2016），蔡博方（2013）等。
5. 1971年6月，《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披露了一批描写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是由一名前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透露给外界的。在文件公布之前，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的发表，但未果。这批国防部的绝密档案表明，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这引发了美国民众新一轮高涨的反战情绪。尼克松政府试图以“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起诉艾尔斯伯格。但艾尔斯伯格最终在宪法保护下被法院判定无罪，新闻业特别是《纽约时报》的声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6. 参见Carey（1987b），詹姆斯·W·凯瑞（1999/2009：49-64）等。
7. 何兆武先生甚至指出，整个十九世纪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就是科学的世纪。理性的高涨让人们有纳一切事物为科学的冲动，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从孔多塞到斯宾塞都深信科学、理性的无穷力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粉碎了这样的冲动。参见何兆

- 武（2017：41-42）。
8. 这一点可以参照凯瑞对于美国新闻史研究辉格主义倾向的批判来理解。他认为，传统美国新闻史并没有书写真正的“新闻史”，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轨道。这与对“新闻”认识不足有关。所以他一再强调新闻史并不是新闻机构史、新闻媒介史、新闻技术史，而是作为实践的新闻史。由此可以发现，其新闻观与新闻史观内在思想的一致性。参见Carey（2000c）。亦可参见方晨、李金泳、蔡博方（2016），蔡博方（2013）。
 9. 凯瑞是出于学术立场的不同和对逻辑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厌恶，才寻找和挖掘了传播仪式观思想（凯瑞，1989/2005：10）。他在与 Grosberg 的对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Carey & Grossberg, 2006：199-205）。这种出发点与他对“作为民主的新闻”的思考逻辑起点不同。
 10. 许纪霖以德国启蒙运动出发，指出了文明与文化、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不同。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试图建立一种普世文明，而原来具有普世文明意义、具有“天下主义”情结的中华文明近代在与西方文明的交锋中落败而成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参见许纪霖（2016：3-3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芭比·泽利泽（1999/2009）。使街坊运转起来——公共新闻学之不可行。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郭晶晶译）（第149-1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蔡博方（2013）。教育家或研究者？公民或记者？反思James W. Carey的知识贡献。《传播研究与实践》（台北），3（2），141-158。
- 方晨，李金泳，蔡博方（2016）。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国际新闻界》，（2），131-149。
- 方师师，於红梅（2010）。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建构。《国际新闻界》，（10），14-22。
- 樊水科（2011）。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国际新闻界》，（11），32-36。
- 郭建斌（2006年8月）。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深圳。
-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821/1979）。《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兆武（2017）。《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哈罗德·伊尼斯（1951/2003）。《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胡翼青，吴越（2014）。凯瑞的“仪式观”：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新闻与传播研究》，（6），49-60。
- 杰伊·罗森（1999/2009）。理念的行动：公共新闻事业的建筑形式。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21-4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1999/2009）。共同利益为第一原则。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65-8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李欧梵（2002）。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国际新闻界》，（3），12-13。
- 李金铨（2017）。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开放时代》，（3），209-223。
- 罗伯特·麦克切尼斯（2000/2004）。《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迈克尔·舒德森（1999/2009）。公共新闻学关于新闻知道什么，关于“公共不知道什么”。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114-12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1969/2003）。《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潘忠党（1996a）。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4），8-14。
- 潘忠党（1996b）。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5），16-24。
- 潘忠党（2005）。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载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第103-12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约翰·彼得斯（1999/2009）。公共新闻事业与民主理论——四个挑战。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97-1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约翰·保利（1999/2009）。新闻学与公共生活社会学。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130-14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西奥多·格拉瑟（1999/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3-1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许纪霖（2016）。两种启蒙：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载许纪霖，刘擎（主编），《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新文化运动百年省思》（第3-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詹姆斯·凯瑞（1999/2009）。保卫公共新闻事业。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49-6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詹姆斯·凯瑞（1989/2005）。《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

- 京：华夏出版社。
- 詹姆斯·马丁等（2006/2012）。《美国史》（范道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展江，李洋（1999/2009）。导读：民主实验和新闻改革。载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第1-2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 朱学勤（2003）。《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
- 周鸿雁（2012）。《隐藏的维度：詹姆斯·W·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周兵（2013）。《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郑保卫（2002）。新闻≠传播≠媒体——对《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及回应。《国际新闻界》，（5），32-36。
- Carey, J. (1970).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part 1]. *The American Scholar*, 39(2), Spring, 219-241.
- Carey, J. (1974).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6(2), 227-249.
- Carey, J. (1978). A plea for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55(4), 846-855.
- Carey, J. (1987a). Journalists just leave: the ethics of an anomalous profession. In Maile-Gene Sagen (Ed.). *Ethics and the media* (pp.5-19). Iowa City, IA: Iowa Humanities Board.
- Carey, J. (1987b).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The Center Magazine*, 20(2), March/April, 4-32.
- Carey, J. (1993). The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7(1), March/April, 1-21.
- Carey, J. (1997a).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228-257).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rey, J. (1997b).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 liberty and public life in the age of glasnost.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207-227).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rey, J. (1997c).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128-143).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rey, J. (1997d). Community, public, and journalism. In Jay Black (Ed.). *Mixed news: the public/civic/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debates* (pp.1-15).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Carey, J. (1999). Innis “in” Chicago: hope as the sire of discovery. In Charles R. Acland & William J. Buxton (Eds.). *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pp.81-104). Montreal, 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2000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are names for the same thing. *Nieman Reports*, 54(2),

- Summer, 67-68.
- Carey, J. (2000b). Scholarship, research and jour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22(2), December, 17-22.
- Carey, J. (2000c).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 *American Journalism*, 17(4), 129-135.
- Carey, J. (2001). Lawyers, voyeurs, and vigilantes. In Robert Giles & Robert W. Snyder (Eds.). *What's next? problems & prospects of journalism*(pp.19-26).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arey, J. (2003). American journalism on,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In Barbie Zelizer & C. Stuart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pp.71-90). London, UK: Routledge.
- Carey, J. (2005). Historical pragmat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Media & Society*, 7(4), August, 443-455.
- Carey, J. & Grossberg, L. (2006). From New England to Illinois: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James Carey in conversation with Lawrence Grossberg: Part2. In J. Packer & C. Robertson (Eds.).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pp.199-225). New York,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Carey, J. (2007). 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s: a proposal and essay.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1), 3-16.
- Carey, D. (2009). A bibliography of James W. Carey. *Cultural Studies*, 23(2), 304-320.
- Herman, E. & Chomsky, N.(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Nord, D. (1988). A please for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5(1), Spring, 8-15.
- Nord, D. (2001). *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ooley, J. (2016). *James W. Carey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utation at the university's margin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Rosen, J. (1997). "We'll have that conversatio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thought of James W. Carey. In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191-206).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Rorty, R. (1999).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New York, NY: Penguin Putnam Inc..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chudson, M. (2008).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1031-1042.